

西学术文化早已“一蹶不振”，也就不会出现西凉“李、尹王敦煌”^①、南凉“四夷之豪俊”、“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秦雍之世门”“内居显位，外宰郡县”^②的现象，更不会出现北魏灭北凉之时尚有可徙之世家大族了。

众所周知，由于河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民族构成，使其文化自古以来就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河西儒学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代表河西学术文化之全部。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文化，在五凉之后才真正进入发展的高峰期^③，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更加雄辩地证明，以敦煌石窟文化为代表的河西学术文化，绝不仅仅只包括河西儒学，还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以及天文学、雕版印刷术、医学、变文、诗歌等众多内容^④。另外，正如李文所言，“隋唐科举制度的推行，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士人成长的‘学在家族’的传承模式，”但科举制乃是隋唐选举人才的主要制度，举国皆然，并非专门针对河西一个地方，而“学在家族”传承模式的断绝，也非凉州一域。果如此，则学术“一蹶不振”的就不仅仅是河西地区，举凡科举制推行之处，学术一片萧条。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由此可见，所谓五凉之后河西学术“一蹶不振”或者“回到蛮荒”的论断既难成立，而将佛学摒于河西学术之外，也是根本错误的。

四、关于陈寅恪学术观点的争论问题

前已论及，陈寅恪先生关于五凉时期河西移民的相关论断，对我

① 《晋书》卷96《列女传》，第2526页。

②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③ 参见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7页。

④ 参见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第199—276页。

国中古历史研究的影响自是毋庸置疑的,但若将其学术观点僵化,则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陈先生的论断只是后来者研究相关问题时可以参考的一种学术观点,但绝不应视为研究相关问题的唯一标准。而且,包括陈先生在内的所有史家,并不可能穷尽一切历史真相。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利用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真相,探求历史规律。

至于五凉时期河西移民的影响如何,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它并不取决于陈先生或者别的学者怎么说,关键在于依据可靠的史料,通过科学的分析之后得出结论。但若误解前贤的相关论述,却是有负于前贤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李文所引陈寅恪关于河陇文化在制度方面有所贡献的两处论述备列于下:

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至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详论者也。^①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②

李文指出,上引陈先生第二段论述的“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中的“五百年延绵一脉”,“自然是指汉武帝年间至北魏太延五年。其间500多年的时间”,继而提出疑问:“如果是‘延绵一脉’,那就意味着河陇学术是连续传承的,‘转移’之论又从何说起?”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一是关于陈先生“五百年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43—44页。

间延绵一脉”时间的推断。我以为,陈先生所论“上续汉魏,下启魏齐”之下限,并非指北魏灭凉的太延五年(公元439年)而应是指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代。若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浑邪王降汉算起,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即公元477年计算,则陈先生所指“五百年间”实际在598年以上,接近600年。我之所以以孝文帝改革时代为下限,是因为李文所引陈先生第一段论述中有“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的内容。众所周知,“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但当时并未对北魏产生深刻影响,只有到孝文、宣武两代,河西文化的影响才显现出来。其二,关于“绵延一脉”的认识。陈先生说河陇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河陇学术连续传承不错,但若将河陇学术及其传播局限在河陇地域,则大谬不然。联系上引陈先生两段论述,可知陈氏所谓河陇学术之“承前启后”,“前”即指汉、魏、西晋之学风,“后”则为“(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其中“北魏、北齐制度”,主要指北魏孝文、宣武以来的典章制度。此处陈氏所指“河陇文化”,并不在河西或者陇右,而是指北魏、北齐所继承的河陇文化,其所影响之地域,主要是指中原和关中。但即便如此,北魏、北齐等所继承的河陇文化,仍与此前河陇文化一脉相承。

另外,李文认为陈先生所论之“转移”,“首先强调的是文化重心转移,其次才是移民转移。”李文所谓“文化重心转移”的依据,是陈先生的另一段论述:

兹所论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于下: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

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①

但仔细阅读该段议论,发现其中并没有论述“文化重心转移”之事。陈先生该段议论的中心,是在强调河陇之所以能够保存中原学术,在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以及“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重要”,而学术转移的背景是中原丧乱,河西“尚称治安”。此处陈先生所指“中心”,是指学术传授的方式,并非文化的“重心”,而云“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重要”,也是强调因学术传授模式转为“家学”,传统的以京邑教化为中心传授学术文化的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即从京邑转到某些“尚称治安”的地域。但这并不是说,学术传授模式的变化,直接导致文化重心的转移。即使真正发生转移,当时中国文化重心也未必已经转移到河陇。果如此,那么当时号称中华正统所在的江南汉族政权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永嘉之乱”后部分中原士人迁入河西,但更多的则迁往江南。依此来看,当时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重心,更应在江南而非河陇。由此可见,陈先生所谓文化转移,一是传统文化中某些具体内容的转移,而非文化重心之转移;二是这些文化内容转移的载体,是“永嘉之乱”后的移民。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第23页。